

花儿 论集



编 者 的 话

花儿，这种流传于甘、青、宁三省（区）汉、回、土、东乡、保安、撒拉、裕固、藏等八个民族人民中的具有独特高原风格的民歌，以它那丰富的内容、优美的曲调和浓郁的乡土特色，长期以来，受到民间文学和民间音乐研究家们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近几年来，在花儿的源流、体系、流派、格律、艺术特色、音乐结构、演唱技巧以及花儿与有关人文科学的关系等方面，出现了许多研究文章，使花儿的研究工作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由于我省花儿研究会的建立和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在花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也越来越活跃。一九八一年七月下旬，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甘肃分会、甘肃省群众艺术馆在兰州召开了甘肃省首届花儿学术讨论会。青海、宁夏的花儿研究专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从会上宣读的二十六篇论文来看，不但贯彻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而且回顾和总结了以往花儿研究的成绩，探讨了花儿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花儿研究的新资料，开拓了花儿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这本文集中的论文，就是从这次花儿学术讨论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选出来的。这既是我省近年

来花儿研究成果的反映，也为进一步深入开展花儿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今后，我们还将陆续把研究花儿的论文选编成集子出版，不断提高花儿研究的水平，促进花儿这种民间歌谣的繁荣。

我们设想，这本集子如果能引起更多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关注，那就好了。我们还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心花儿、演唱花儿、研究花儿，使花儿在我省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开”得更艳丽，使花儿的研究工作为继承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1981.11.1

目 录

编者的话

努力攀登花儿研究的新高峰·····	柯 杨 (1)
花儿的搜集出版和研究状况概述·····	岷 文 (23)
花儿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魏泉鸣 (37)
甘肃花儿研究人物两题·····	刘 凯 (51)
花儿是反映生活的画卷·····	马文惠 (57)
别开生面的民歌演唱会	
——甘肃省莲花山花儿会调查报告·····	魏泉鸣 (72)
花儿溯源·····	柯 杨 (86)
花儿源流试探·····	马 珑 (106)
花儿源流两题·····	李 林 (116)
怎样追溯花儿之源·····	杜亚雄 (126)
花儿的体系浅说·····	周梦诗 (129)
论洮岷花儿的艺术性·····	王殿 雪犁 (141)
试论花儿的体系与流派·····	卜锡文 (159)
花儿的格律和民间文学工作的科学性·····	郗慧民 (176)
试论花儿的音调特点·····	李恩春 (191)
花儿漫谈·····	鲁 拓 (217)
花儿与民俗·····	鲁晋 段平 (229)

努力攀登花儿研究的新高峰

柯 杨

花儿是丰富多采的中国歌谣百花园中别具色香、引人注目的一枝。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所创办的《歌谣周刊》第八十二期（1925年3月15日出版）上，就曾刊登过袁复礼所搜集的三十首花儿。这可说是目前见诸报刊最早的花儿作品。花儿研究的历史，如果从张亚雄先生《花儿集》的初版问世（1940年）算起，至今也已有四十多年了。

全国解放三十二年来，在各地党组织和文艺部门的关怀和支持下，在一大批花儿爱好者、研究者的不断努力下，花儿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从以往我所见到的有关花儿研究的文章来看，不论是专题研究还是综合研究，也不论是调查报告还是情况介绍，一般说来，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与以下十个方面有关的问题：①花儿的产生、演变、体系、流派及其发展史的研究；②花儿同人民生活的关系及其社会作用的研究；③花儿的思想内容及艺术特点的研究；④花儿格律的研究；⑤花儿音乐结构及其演唱风格的研究；⑥花儿中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研究；⑦

花儿会的形成及其社会意义的研究；⑧花儿语言特点的研究；⑨著名花儿歌手的研究；⑩如何从花儿中吸取营养来进行诗歌创作的研究。这十个方面的论题，都是很重要的，其中部分问题的研究，可以说已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水平。青海的同志在花儿的 research 方面动得早、抓得紧、成果多，许多方面都值得我们甘肃的同志们学习，象李文实、王浩、黄荣恩、朱仲录、刘凯、张谷密、赵存录、杨正荣、邓祥通、谢承华、邓靖声、魏明璋等同志，在花儿研究方面，都曾做过不少工作，有过一定的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同志们的花儿研究工作，过去的情况我了解得不够，但近年来，象王世兴、杨少青、常憬存等同志，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们甘肃省的花儿研究队伍中，张亚雄老先生当然是功劳卓著的。另外，象唐剑虹、周健、吴月、汪玉良、雪犁、郝慧民、卜锡文、苏平、魏泉鸣、李林、周梦诗、鲁拓、李恩春、鲁晋等同志，也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北京的汪曾祺和南京的孙殊青，可说是花儿故乡以外的关心花儿、研究花儿的代表性人物，不能不提到他们在推进花儿研究方面所作的努力。

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过去若干年来花儿研究成果的同时，有必要回过头来看看以往所走过的道路，看看有些什么缺门和空白点，有些什么不足之处和局限性。我想，这对今后的大踏步前进和攀登新的高峰是很有必要的。我这里所说的不足之处和局限性，并不是指大家在学术观点上的若干分歧意见，而是指我们大家都还没有注意到、或虽然注意到了但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把意见充分表达出来的那些影响花儿

研究水平提高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我打算将这些问题结合我对今后花儿研究工作的一些设想和建议一起提出来，与同志们进行讨论。

一、要把花儿研究纳入民间 文艺学的科学体系之中

民间文艺学是以劳动人民所创造的语言艺术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它对于我们这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深入研究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精神、文化财富，对于人民斗争历史的了解；对于多种人文科学的研究；对于推广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等，都是有重大作用的。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既然都称为“文学”，当然就会有若干共同之处。然而，民间文学本身却又有许多不同于作家文学的地方，有它的特殊性（或者叫做“个性”）。民间文艺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来探讨民间文学的这种特殊性及其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规律。民间文艺学应当有它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但长期以来，我们许多人却只是用适应于作家文学的文学理论（它是通过研究作家文学而概括出来的理论）来研究民间文学，这就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一些问题，产生了一些缺陷。这种“用量儿子的尺子来量母亲”的法做，正是造成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质量

未能很快提高和尚未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完整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的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借鉴已有的文学理论是必要的，但用它来代替从民间文学本身所总结、概括出来的理论则是很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不同的研究对象，应当充分注意到它的特殊性，把注意力集中在它本身的发展规律的探讨上，同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还要运用与之相适应的原理与方法。这样，才有可能取得科学研究的成果。

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应当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呢？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钟敬文教授在今年民研会首届年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来看，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①一般理论研究（如民间文学的特征、民间文学与劳动人民生活的关系、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各民族民间文学的相互交流与影响等等）；②民间文艺史（包括通史与专史）；③民间文艺学史（即关于民间文学理论研究的历史，包括搜集、整理、编纂工作的理论发展史在内）；④民间文艺学的方法论（有观点性方法与技术性方法之分）；⑤民间文艺资料学（包括搜集、整理、编纂、编目、分类、索引以及资料的鉴别、辨伪、保管与交流等）。

在民间文艺学这门学科之下，又有若干分支，如神话学、故事学、歌谣学、史诗学等等。这些分支，可说是第二级的、专题的研究。而我们大家所从事的花儿研究，则属于歌谣学的范畴，是一种更为专门的第三级的研究，甚至可以

称为“花儿学”。

通过以上概述，大家就会发现，从民间文艺学的整体来看，我们的花儿研究工作还有不少缺门和空白点。比如花儿“研究史”和“方法论”方面，我们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而一般理论研究、花儿史和资料学三个方面，也只做了一部分工作。如果我们不从民间文艺学的整体着眼，只局限于花儿作品这一个小范围，就不容易发觉我们研究工作中的弱点和问题。

为了把花儿的研究真正纳入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之中，以促进花儿研究的更快发展和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认为首先有必要澄清对几个问题的认识。

第一、要把理论的研究和应用的研究区别开来。严格地说，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主要是指理论研究的科学体系而言，它与应用的研究虽然有一定联系，并为应用的研究提供理论根据，但这两类研究的着眼点和角度是不相同的，不能在它们之间划上等号。所谓应用的研究，是指民间文学的推广、普及、以及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加工、改编和再创作等提高性的研究而言（应用的研究，国外也有，如芬兰人E·隆诺特于1835—1836年出版的《凯勒维拉或有关芬兰人民轶事的卡勒里古诗》、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关敬吾学派所出版的民间故事丛书等等均属此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民间文学工作者，把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加以整理，再普及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同时，我们的文学艺术家根据民间文学加工、改编

和再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具有民族特点的文艺作品，对于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为世界文艺之林提供具有我们中华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也是一项义不容辞的历史任务。但是，我们却不能把应用的研究和理论的研究当成一回事，不能把两者混淆起来。不然的话，这着眼点不同的两个方面的工作都会受到牵制和干扰。比如说，理论的研究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要求作品、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而应用的研究，则从宣传、教育的角度出发，要求作品、资料的可推广性和可普及性。理论的研究着重探讨对象的发展规律而从理论上阐明它本来是什么样的和为什么是那个样子的；而应用的研究则从对象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效果方面考虑，虽然也应注意了它的产生、发展和历史地位，但更多地是从它今天应当是什么样的以及怎样才能使它发挥更好的作用方面着眼。这两类研究各有侧重，因人而异，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即所谓“车走车路，马走马路”，各有任务。但由于我们部分同志过去对这一问题认识不清，所以就产生了某些矛盾，甚至一方说“你伪造、篡改！”另一方则说“你复旧、保守！”一些报刊编辑同理论研究者之间的分歧，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将这性质不同的两类研究工作区分开来的缘故。实际上，各门人文科学的研究，由于时代的急剧变化和学科本身的不断深入，大都分成了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研究领域，即对传统的研究和对当代的研究。前者不要凝固化，要有发展观；后者不要狭隘的功利化，要有继承性，这才能使我们的工作不断前进。从以往全国的实际情况分析，较重视应用

的研究而忽视了理论的研究（这与左倾思想的影响和片面理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口号有关），所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贾芝同志最近在多次讲话中都比较强调加强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在搜集、整理工作中要充分注意真实性、科学性的问题。我想，花儿的研究也应当包括理论的和应用的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只要我们大家既认识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又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差别，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就能更好地开展起来。

第二、要充分认识民间文学的多功能性。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成为多种人文科学研究中极为宝贵的、不可缺少的资料。过去，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一特征认识不足，大都局限在文学的圈子中，喜欢把民间文学同作家文学相比较，并用一般的文艺理论来要求民间文学，这就影响到我们研究水平的提高。比如，民间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的重叠手法，在作家作品中有时可能是一种缺点，但在民间文学中则恰恰是一种特点，甚至是优点（这与劳动的节奏和口头流传的特性有关）。再如，民间文学中许多在今天的人看来往往是不合理的现象，其实恰恰给我们揭示出了古代人民生活或社会制度的某些信息（如西王母的传说告诉我们，在古代中国的西北高原上，曾有过母系氏族社会；而阿诗玛与阿黑既是兄妹、又是情人的关系，则告诉我们，在撒尼人的历史上也曾有过级别群婚制度）。所以说，把民间文学作品仅仅作为文学现象来研究，就如同只知道木料可以做家俱而不知还有许许多多别的

用途一样，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花儿”，过去虽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总的水平还不高，大都停留在描述性的阶段，缺乏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比如，真正从美学的角度研究“花儿”的文章至今未见到一篇就是明证。所以，从文学的角度研究花儿，也面临一个急待提高的任务。

第三、花儿的研究要有所突破，必须把我们的思想从一般常识的束缚和习惯了的思路中解放出来。一般的常识或习惯了的思路，往往对科学研究起一种束缚或阻碍的作用，而不是起一种推进的作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最怕被“常态”霸占了自己的脑海而丧失创造性的见解。什么是创造性的见解？我个人的认识是：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创造性的见解往往是一种不同于普通常识的思路，是对司空见惯、众口一词的事物从一个新的角度上进行解释和说明，从而启发人们更深刻地去认识这个事物的本质。举一个例子来说。花儿作品中固然有不少“秋风嘶马”、“塞上鸣笳”的豪放之作，但也的确有相当数量的“摇曳如诉”、“凄切哀悲”的作品（不论从歌词还是曲调方面来看都是如此，民歌是“以诗为本，以声为用”的，科学的记录，应当是词、曲并记，不然就会使研究工作受到限制），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我们对后面这类作品的研究却甚少。其原因大约有二：一是认为把劳动人民的作品说成悲哀的，在政治上似乎不大合适，故避而不谈；二是对这种作品的社会意义和美学意义缺乏深刻的认识，再加上某种概念的束缚，故不去认真地探讨

它。而事实上，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和文艺家对此曾有过大量的论述。他们总的看法是：好诗、好音乐，往往是与忧悲有联系的，是能够催人下泪的，即所谓“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借引起人的怜悯与恐惧来使感情得到陶冶（净化）。鲁迅说，悲剧是把那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英国诗人雪莱认为，“最谐美之音乐必有忧郁与谐。”李大钊也写道：“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在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我国许多民族在嫁女时，都要请新娘的女友来陪唱“哭嫁歌”（这种歌的产生当然有它的历史原因，但到了后来，却变成了一种娱乐和美的享受），这绝不是偶然的。人们为什么总要花钱去“流泪”（指看悲剧），来得到精神上的享受呢？这正是心理学上所谓的美感与痛苦相伴生的规律的反映，是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论题，花儿研究家们对这类问题也应当予以重视。只要我们是从事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定义或某种概念出发；是通过对事实的分析来得出科学的结论，而不是以某一概念为前提，再从事实中去寻找符合这一概念的例证，那么，我们的学术思想就一定会进一步活跃起来，实现“花儿”研究的新飞跃。

二、要开拓视野，扩大 花儿的研究领域

前面我曾提到，花儿作为一种民歌，既是文学，又不仅

仅是文学，它还有着更为广阔的作用和学术价值。所以，充分认识它的多功能性，就成为扩大花儿研究领域的极为重要的思想前提。

我觉得，花儿是洮、岷、河、湟地区乡土文化中的佼佼者，它在这一地区的民俗、方言、历史、民族、宗教、社会诸问题的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资料价值。过去，由于许多研究花儿的人都是搞文艺工作的，大都喜欢从文艺的角度去研究花儿，再加上长期以来对民俗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等人文科学重视不够，所以就大大限制了花儿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同志们大概都有过这样一种体会：如果长时期在一个领域或一个比较狭窄的范围内工作而不同时补充其它方面的知识，在研究工作中就很难取得新的成果。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各门学科、各个环节的交界处是大有文章可作的，许多重大的成果和新的突破，往往就出现在各门学科、各个环节的交叉点上或边缘上。因此，我们要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多角度地去看待和分析问题，花儿的研究就一定会有新的成果出现。

这里，我想举一些例子来说明花儿与民俗学的密切关系。

民俗学这个名称，是从日语来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沿用至今。而日语的“民俗学”则又来自西方。一八四六年，英人W·Thoms创造出了Folklore一词，意思是“民众的智慧”或“民间的学问”，日本人把这个词译成了民俗学，也被中国的学术界所接受。民俗学成为一门独立的人文

科学，才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资产阶级的民俗学，主要研究流行于原始民族和保留于文明社会中的劳苦大众当中的风俗、信仰、习惯、仪式、禁忌等精神、心理方面的文化现象。而马克思主义的民俗学，虽然也以研究各民族传统的民间文化为中心内容，但却十分强调民间传统的经济结构同它的上层建筑结构之间的交叉与联系（亦即对立统一规律在传统民间文化上的表现）。我们的民俗学，主要包括民间文艺、民间娱乐、民间风俗、民间信仰、民间组织、民间技艺、民间器具等。作为具有浓郁乡土特色的花儿，同洮、岷、河、湟一带各民族的民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以这样说：不研究这一地区的民俗，就很难使花儿的研究深入下去。

比如，大家都知道，花儿中用牡丹作比喻的作品相当多，这同洮、岷、河、湟一带的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喜种牡丹、酷爱牡丹的习俗是分不开的。吴镇在自己的诗中就曾写道：“我忆临洮好，春光满十分，牡丹开径尺，鸂鶒过成群”；“洮水多花木，牵情是牡丹”；“牡丹随处有，胜绝是河州”；“牡丹真富贵，狄道颇称雄，绝艳生天末，芳华比洛中”；“袍罕花称小洛阳，金城得此詎寻常”。这些诗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些地区种植牡丹的盛况。河州（今临夏）一带的牡丹恐怕是从新疆移植来的。唐人李商隐有《回中牡丹为雨所败》诗，其中有句云：“下苑他年未可追，西州今日忽相期。”西州者，唐时的高昌，是西州回鹘建国之地，在今吐鲁番东南。河州一带的撒拉族、回族中，大都是从西部迁来的，也带来了当地种植牡丹的爱好和习俗。临夏

过去不论大户小户，回族汉族，凡院落有空闲之地，均用来种植牡丹等花卉，每当花开之日，家家户户大开，欢迎外人参观、品评，称之曰“浪牡丹”，为一年花事之盛典。为了避免风吹日晒和延长花期，小康以上人家还备有大型天幕来遮掩花丛，其兴趣之浓和爱好之深，由此可见一般。回族工匠旋成元、周声普砖雕牡丹等花卉为河州一绝；清代陇上回族画家马虎臣，晚号南潭遗叟，居兰州，宅名大碧山馆（又称碧云仙馆），花鸟虫鱼无不精工，尤擅长画墨牡丹，故人称“马牡丹”。以上资料说明，正由于这一带各族人民种牡丹、看牡丹，熟悉牡丹的习性和特点，使牡丹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所以，花儿中以牡丹作比喻的作品甚多，甚至产生了专唱牡丹的《十二月牡丹》一曲，就不难理解了。这也可以说是艺术源于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例证。

再举一个有关民俗的例子。花儿中有句云：“大石头根里的药水泉，担子担，桦木的勺勺儿舀干。”这里所提到的药水泉，在花儿中经常出现，它并不是兴之所至、脱口而出的随意之词，而是与一种民间风俗有关。《西宁府续志》云：“（药水泉）在（碾伯）县南一百七十里古鄯慈利寺西，自山崖石孔流出，潺潺不竭，腾腾有声，其味辛温，饮之愈胃疾。每岁六月六日，远近居民多趋饮之。原有药王庙，遭乱焚毁，今重建焉。”当地人民“喝药水”的日子，也正是花儿会的会期。河州人过去的“浪河滩”，很有点象半农半牧区或农业区藏族人的“香朗节”（采薪节），每逢夏日的某个时候，大家携带帐篷、锅灶、食品等物，在远离